

大战略

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

公方彬◎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大战略

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

公方彬◎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战略：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公方彬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218 - 10738 - 7

I. ①大… II. ①公… III. ①国家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3077 号

DA ZHANLUE: YI XIN SHEJI ZOUCU ZHONGGUO JUEQI DE XIN LUJING

大战略：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

公方彬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段太彬

封面设计：仙境

责任技编：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27 字数：440 千

版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 - 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序言：思想家，远看很美

公方彬

没有比思想更宝贵的东西，也没有比思想更可怕的东西。思想就像一束带刺的玫瑰，在放射出艳丽与馨香的同时，还有可能刺伤一些人。既然思想存在二重性，那么产生思想的思想家更是如此。思想家可远视而不能近观，远看很美，近观很无奈，甚至很悲摧。

远看很美，是因为思想家拥有高贵的品格，这种品格最显著和最本质的特征，是明知前面是死亡，仍然义无反顾扑向死亡。或者说，思想家是具有准备的自我牺牲推动社会以致人类前行。正是这种人类社会的至大、至善、至美的品格，而产生强大的道德感召和精神激励，进而催开绚烂的思想花朵。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这样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其实，牛顿的力学定律实现了人类以自然动力向人工动力的转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让人类明白时间和空间等全新的领域……所有这些科学成就，都莫基于道德。这也是中国智者早就阐明的：“小胜在智，大胜在德。”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古希腊思想家的褒扬，反映出相似或相同的价值判断。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为什么希腊让欧洲人产生家园感？因为希腊文明催生了欧洲文明。西方文明有三个基本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而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光耀千秋，是因为那里产生过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是他们指引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尤其是，他们中有人为了探求真理，不惜放弃生命。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当属苏格拉底，他甚至就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或许可以这样说，思想家品格高尚是因为他们走在遏制物欲，甚至是消灭肉体的道路上，具有殉道的特点，由此而实现精神和思想的永生。所谓“有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指的就是这样的人。既然他们的精神和品格化作了让人“仰望的星空”，就注定产生深及灵魂的感动，进而形成精神家园。

近观无奈甚至悲摧，原因并非起于思想家本身，尽管思想过程就是痛苦的过程，而主要在于人类社会为思想家设定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行走在这条道路上，注定笑也凄清，乐也悲怆。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思想，一般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超越时代，不以现实和直接功利为考量，因而为时人所忽视；另一个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着眼于全人类，且很容易与特定国家的特定制度和价值系统发生冲撞，因而让执政者反感。社会原本维系着一种平衡，哪怕停滞不前，也是一种平衡，只要打破平衡，就必须付出代价，打破的程度越深越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这个代价可以由执政集团承担，也可以由思想家单个人来承担，即使最终是前者，现实只能是后者。这就是思想家越伟大，及其思想遇到的排斥力越大，个人承担的代价就越大，灾难也越深重的重要原因。原本，思想家开始思想的时候，已经做好付代价的思想和心理准备，问题在于代价有时不仅仅由思想家个人承担，超出部分还须亲友团来承担，这显然是一般人所不能承受，或不敢承受之重。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类思想史上仍然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前仆后继，执著前行？为什么在特定时期和某一国家、民族、区域甚至会集中产生一批思想家？其实是内在规律使然。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人类注定要寻找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终极命题：我们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价值和如何实现价值？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赢得幸福？沿着这些命题深入下去，拓展开来，便进入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多命题随之产生，并要求思想家来探究。这是整个人类的使命任务，已经化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又是这种力量催生出思想家，也就是走在最前面的那批人。有人走在前面，源于自然性抑或必然性。人在社会中存在三种状态：先行、落伍、守中道而不逾矩。齐步走不可能，总有人走在前面，只不过思想家不是被动走在前面，而是主动走在前面，跑步在前面，这也是思想家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既然是一种内在动力，伴生于人类前进的全过程，那为什么思想花朵没有在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开放？自春秋以降，特别是世界脱离各文明区自然演进，进入可交流、可比照的“全球化时代”，时间上以西班牙开启大航海时代为节点，至今已有500年的时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大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因为我们没有催生伟大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的土壤和精神动力，一句话，思想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基本不具备。

首先，封建统治方式与社会更替模式都抑制思想家的产生。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不喜欢思想家，“文字狱”、“八股文”都是消灭思想家的方式或手段。而中国社会变革多采取“农民运动”的形式，很容易从肉体上消灭思想家，因为农民运动的最大特点是杀头，并且是杀有钱人和当官者的头，这些人一般有文化。这些民族特点带有根本性、决定性。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更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而是“附于皮上的毛”，要生存下来，必须仰赖统治者的恩赐，同时还要努力适应中国社会的变迁模式。就统治者来看，其更关注的是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非创造什么。为什么周游列国的孔子被霸主们拒之门外？不是其思想无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王朝鲜有不尊孔重儒者，这已经说明儒家思想对于帝王统治的功利价值，只是孔子生不逢时，那时帝王们最需要的是能够开疆拓土的谋略家孙武，能够放大本国力量的纵横家苏秦。一个为帝王提供统治术的孔子尚且如此，如果与帝王统治相左的思想家该有怎样的结果？不言而喻。此外，中国社会变迁很少通过妥协的方式完成进步，基本上采取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表示与旧王朝的差异，又多采取切断文化的方式，比如，中国历史上规模

性焚书事件就发生过十多次。如此等等，中国的历代知识分子要么被招安，要么被砍脑袋，当然也可以遁入山野空门。

即使宽容包容度大大提升的当下，放飞思想，深度揭示政治领域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是一件顺理成章和自然而然的事情。比如，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又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这些重大而根本的命题至今没有很好地回答，因而一直困扰着全党乃至全社会。为什么迟迟不能解决？

上述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一定意义或一定程度上是世界通病。只不过因各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制度设计出现的区别，进而在应对和接受思想家及其思想上逐渐分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佐证。这位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喜欢在公共场所与人讨论问题。诸如，讨论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原本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只是讨论到深处，注定触及现实，因而具有“危险性”。所以，苏格拉底后来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这已经表明思想家的思想与统治者相左的后果。至于后来的布鲁诺，其因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其实这是冲击另一种统治者的必然结果。

当然，西方社会后来进行了反思，特别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政治包容度与社会宽容度大大提高。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是摧垮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然而他们能够在英国生存下来。这的确具有标本意义。之所以如此，在于西方国家政权并非政党所有，所有政务官员，包括总统乃至议员、大法官都是职业。因此，政客们竞争总统和议员的职位，不是在争夺政权，而是追求某一社会职位，以此实现社会价值。这一原理下，政党轮替和总统去职，都非政权垮台，同理反对党上台和新总统就位，也非政权更迭，只是不同人来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责任。既然政权不属于政党或某一群体所独享，也就不那么在意政权的更迭，某种意义上，资本家更在意的是具体的政策制度对自己利益的影响，这比谁去当总统、首相更重要。西方国家，除了法国大革命，更多的是采

取了议会政治的道路，这样下来对思想理论也就不那么害怕，包容和宽容度自然提升，其间存在逻辑关系。

其次，与思想家同宗同源或者同类的知识界和理论界也不喜欢思想家。原因并不仅仅是思想家的思想常常演变为砸饭碗的行动，还有文化心理的原因。当思想家的思想映现出一批人的无能时，注定触动这批人心中的恶，也就是妒忌心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事修则谤兴，德高而毁来。”这皆属于“文人相轻”的社会现象。除非你的成就大到同时代的知识界再努力也无法企及的程度，否则无法避免。问题在于思想的价值往往反映在思想家身后，当代人一般不会将思想家供起来。如果再将党争、政争与宗教派别之争结合进来，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

再次，利益关联者乃至社会大众也不喜欢思想家。思想家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这决定了其不媚上，如此对于那些习惯于唯我独尊的大大小的领导来讲，是很不舒服的事情。至于普通大众不喜欢思想家，主要是大思想与小民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无关且不理解，自然不会喜欢。如果思想家被供起来，成了符号或评价大众有无知识的标志，另当别论，比如鲁迅。此外，还有其他的更深层原因，如普通人存在惰性，更希望平静地生活，更关注物质世界而非精神世界，当思想家的思想冲击了平静的生活，导致心理不适时，注定会受到排斥。再者，中国人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思想启蒙，因而缺少独立思考和独立价值判断，一旦将某个思想家作符号化判断，且属于统治阶级的敌人，人们就不再明辨是非，而是一概排斥。

延伸开来，我们还能理出许多羁绊中国产生思想家的原因。从文化传统来讲，中国一直强调中庸，骨子里不喜欢敢于思想的人。再者，我们一直没有弄清科学的本质，更多是把科学理解为技术，突出器物层面，既然是技的层面，那么功用性就是第一位的，包括知识分子群体也便成了工具，以被统治者赏识和利用程度作为价值的唯一评价指标，这时也便没有再去追求实用价值之外的精神存在。如果对比中国与西方所理解的科学，会发现，西方所理解的科学，是与“意见”或“观点”对应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既然是确定性知识，生发的路径就是人自己，于是有了古希腊神庙金顶上的格言“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就是从人

延伸于社会，延伸于世界，延伸于宇宙的知识。这就涉及什么是永恒和追求不变的东西——科学精神与科学追求。

正是没有了科学精神与科学追求，只是流于器物或功用性，中国的知识阶层一直没有把精力投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而是把重点放在揣摩帝王和领导的意图，而这种人际关系多不是建立于理性和规则。当一种文化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脉络后，就产生惯性和强制性，最后形成独特的文化特性。比如，古希腊思想家重点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那么复兴希腊文化的欧美，便有了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执著于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钟情于帝王驾驭术，终于把统治文化推向世界最发达。正像人们所说的，一部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中国文化史，本质上是一部统治术的形成和完善史。中国人的智慧都用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甚至就是人与人的相互算计上，自难产生现代人文思想的光辉。包括当下研究苏共垮台的成因，理论界还是把重点放在权术上，比如军队脱离党的领导，丧失对舆论的掌控，等等。倘若这样的研究被认可和推崇，也便没有人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权力性质、权力归属，尤其研究优化权力运行和实现权力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度看重权力，就会异化权力，结果就是对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不利于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产生的诸多因素中，首推一点是政府权力过大且无边界。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苏联氢弹之父、著名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一个观点。1968年，萨哈罗夫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的文章，文中说：“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萨哈罗夫的思想 and 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为受到广泛认同，1975年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我们未必需要围绕萨哈罗夫阐发更多，但其观点至少启发我们找到自己的思想路径和突破口。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都决定了中国只能建设“大政府”的制度模式，而不能复制西方的“小政府”。因此，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为了支持思想家和大思想的产生，而改变制度模式和权力运行方式，但找到一个契合点、平衡点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有利于执政和现实发展的制度模式，并不意味着有利于持续发展，要持续发展，要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超越，必须产生思想家及其大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过大的权力与一元化思想相结合，探索性思想必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果再将正误、对错、取舍的裁判权交给政府中的某一部分人，尽管这部分人很聪明，但其以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为天职，决定了他们不会成为开拓者，尤其不会成为思想家生存与创新思想的推动者。于是，一个特有现象自然而然产生出来，任何一个小官僚都敢摆弄理论工作者，哪怕你已经是个很有思想的理论大家，就如同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处长都可以把大企业家摆弄于掌股之间一样。如此卑微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你还敢寄希望有理论工作者升腾出思想的价值感，并且在价值感的推动下逐步提升到思想家的层次吗？断不可能。

政府和政府官员强力管制思想，除了直接限制了思想的生成和传播，更重要的是从最深层次消解了知识界的思想冲动。因为，政府设定一种评价体系，同时规定思想走多远和怎么走，等于消灭了思想开拓的空间，既然没有“皇冠上的明珠”可以摘取，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也便不存在。没有高尚和永恒，精神必蜕变，知识界注定走向思想死亡。为什么宗教信仰中有那么多的殉道者？为什么共产主义信仰曾经让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就是有一种超越功利的精神目标存在，这种精神目标的吸引力甚至超越死亡、压倒死亡。再看，为什么犹太民族产生了那么多大思想家和科学家？比如，诺贝尔奖中有如此之多的犹太人。延伸到再生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可谓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为什么那里也产生了更多的思想家、科学家？很重要的是犹太教及其基督教将神圣感注入信徒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旧约圣经中所讲的，“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有了神圣感，就有了责任和担当。再加上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即由起点而无限，所有虔诚的教徒都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开拓空间，终于实现精神升华，同时生成巨大的精神支撑和创造力。联合国调查了300年来的300名最伟大的科学家，其中除38人无法查

实信仰取向外，其他262人中有242人有宗教信仰，并且主要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这是很值得思考的现象。

当然，这里有一个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绕不开且须作出分析的问题。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一神教”，且都再生于犹太教，既然如此，为什么伊斯兰世界没有产生基督教世界那样多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呢？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初，反映出该教作为一个最后产生的世界性宗教，具有先进性。穆罕默德提出：

“求知对穆斯林男女都是天命”，“求知须从摇篮到坟墓”，“教育孩子一次，强于施粮一升”，等等。正是由于伊斯兰教重知识，重教育，而推动了医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建筑学、艺术、文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领域长足发展，包括代数、阿拉伯数字，以及零的概念，都产生于伊斯兰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也可圈可点，比如，观象仪（星盘）、象限仪等，都有伊斯兰世界的贡献。然而，又是因为伊斯兰教是最后一个世界宗教，且穆罕默德规定到日常生活细节，因而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比如，伊斯兰教虽然承认《古兰经》之前的《圣经》，但却认定《古兰经》比《圣经》在内的一切经典优越，自己是集闪族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哈尼夫思想、伊斯兰教）之大成者。伊斯兰教承认安拉向世间派遣了许多使者，但却强调穆罕默德是“最伟大的先知，最尊贵的使者”，也是安拉的“封印”使者，只要信仰安拉的人都应服从他。特别是穆罕默德以安拉“启示”的名义，创建了伊斯兰教义体系的同时，规定了详细的包括教规、民事、刑事、商事、军事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甚至包括一系列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这就是世界任何民族只要皈依了伊斯兰教，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乃至服饰最终趋同的原因。如此下来，必弱化创新能力。

在中国，主要的是依靠儒家治世，宗教很多情况下处于被抑制甚至被打击的状态，比如佛教就经历了“三武灭佛”的灾难。同时，即使处在被借助状态，宗教也不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后，为了打破宿命观，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而将宗教归为“麻醉人民的鸦片”，与此同时建构起政治信仰系统，即党的成员乃至全社会，精神力量不是从宗教信仰中获得，而是从政治活动中获得。这就必然出现我们国家的特殊现象，体制内的成员主要是靠政治荣誉或政治利益推动，一旦失去这种力量，便失去了精神动力。从思想创造的角度看

问题，中国的知识阶层一直区分为两种存在形式，体制内的学者围绕政治活动找精神力量和价值实现，因而兴奋点在诠释和解读主导思想，而非创造思想；体制外的学者跳出了体制羁绊，但却无法获得思想创造发展的支持条件，结果虽产生了一些思想的火花，但不会星火燎原，只能自生自灭，而不会成长为大思想家。

人文环境不支撑思想家的产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因素。中国未出现过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影响广泛的启蒙运动，因此，某种意义上民众至今未能从蒙昧中走出，甚至有人压根就不想让民众独立思想。我们都知道，文化或文明的发展进步，很重要的源自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乃至当下的一些僵化的社会管理者，不仅不鼓励探索，相反极尽所能压制思想，这是很可悲和可怕的事情。原本，中国的思想家或准思想家，已经在革命的逻辑与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很卑微，如果有可借助的民意基础，境遇可能更好一些，成就可能会大一些，然而这方面状况更糟糕。因为没有启蒙，我们的人文环境其实并不给思想家提供必要的精神或物质支撑。

通过比较我们对此的认识会更深刻。当我们驻足于罗马废墟前作千年幽思，再到米兰比萨斜塔前倾听二战时期该塔之所以幸存的故事，尤其到法国游览巴黎这个伟大的建筑“博物馆”，追溯不被战火焚毁的原因，甚至到德国一些小城挖掘二战废墟上重建时，市民们集体投票选择以半个世纪的建筑周期来恢复旧貌，而不愿迷失于“水泥丛林”似的现代新建筑群，你一定感受到了受过思想启蒙的民众是个什么样子，进而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品格。再看我们的北京城，尽管有千年历史，也曾经有过独特的面孔，然而却如何都无法抗拒政治强力和利益驱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跃进”与“文革”，改革开放后的城建“大跃进”与市场经济，都极大地冲击了北京的文化积淀，尽管这期间又产生了新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当我们回首当年梁思成建议保护北京旧城方案被苏联专家否定时，他竟然是那样的孤独，再下来也就只能是“梁思成哭城墙”、“梁思成哭牌楼”的凄婉故事了。从中是否发现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民众存在着严重的人文品质落后，远不能帮思想家减负，甚至本身就是加载者？

能够引发思考的东西还有很多。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本来可以逃生，日本使馆保证把他送出中国去，但早就决定以死启蒙国人的谭

嗣同说：“我不走，各国变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中国没有人为变法献身，所以不发达，现在就让我开这个头。”如此一个求大勇者，在上刑场时，沿途迎接和送别他的都是民众的辱骂和臭鸡蛋，这种被拯救者向拯救者表达的方式，不是思辨的结果，而是官方给予的强烈“正统”观教化出来的民众已经没有了辨别能力，唯一能做的是伴随“正统”起舞，这样下来何言有求异求思者的土壤和空间呢？谭嗣同是悲剧，“文革”中的顾准也是悲剧。这位1956年就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学者，在遭受迫害期间，仍坚持独立思考，关注民主，追问“娜拉出走后怎样”，也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么办的课题。然而，他没有在思想的道路上走出更远，而是以悲剧告终。

顾准的悲剧性更突出的还是政治性与人性的冲突，因为政治性，其妻子子女与其断绝了关系。尤为可悲的是其子女很长时间里无法解开其中的结。顾准长女后来阅读父亲的文稿，曾写出反思性文字。“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让顾准女儿疑惑的问题，我们至今仍不敢言已经作出科学破解。

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支持思想家及其思想存在的社会基础一直处于增厚过程。仍然借“顾准悲剧”分析问题。顾准六弟陈敏之在1974年11月9日写给顾准长女、长子的信中讲了一些让今人感佩的话语：“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眼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还有那个叫徐方

的姑娘，她写给顾准的信也证明思想家有同路人，哪怕政治生态多么严酷。1974年11月18日，顾准收到同事的女儿徐方的信，阅读过程中他泪流满面。“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这个目标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这样的话语不仅仅慰藉着顾准苦涩的心灵，同时温暖着走在思想道路上的每一个人。总之，悲剧与思想家如影随形，且未必不是悲剧而放大思想家和他的思想。还可以说，悲剧原本就是成就思想家的最大营养液、推进剂。因为，悲剧虽使人痛苦，但使人深刻。又是悲剧中孕育出来的思想，更让人类获得教益。

一般而言，成就为思想家的关键，是要有坚定的信仰信念、正确的价值观及其修为。如果强调辅助条件，上述三个方面至少要有一个方面存在。或集团的支持，比如教会带来的宗教信仰，政党灌注的政治信仰，二者有其一，即能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或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也是思想发酵与作用发挥的土壤所在。再一个便是思想家的亲人特别是主要家庭成员给予的支持，这是艰难状态下的最重要的抚慰。如果三者都不存在，那么，思想家的产生就只能是特例，而不可能形成群体。

不管有多少不利因素，毕竟今日中国需要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以支撑中国走向世界，发挥引领作用。所以，哪怕我们无法短期内去除羁绊思想家产生和大思想传播的种种因素，但可以创造条件，以求不断改善。当下最能做和该做的是激发残存于知识界、理论界的微弱良知；让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脉动中，激荡、张扬、放大，逐渐成为时代强音和动力之源。当思想家把自己置于殉道者的位置，一种不可遏制的创造冲动就会生发出来，直到人生的顶点和生命的终点。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修养！以修养的高度提升思想的高度，即以思想抚

慰自己的灵魂，这大概就是奥古斯丁与卢梭分别产生巨著《忏悔录》的内在原因。这里借佛教禅语喻义。弟子问达摩，人怎样才能变得快乐？达摩道出四重境界：一重境界，把自己当成别人，这是无我；二重境界，把别人当成自己，这是慈悲；三重境界，把别人当成别人，这是智慧；四重境界，把自己当成自己，这是自在，即自给自足，自由自在。思想家需要到达第四重境界，超越社会羁绊，实现精神升华。

最后，我们需要强调，不管做思想家多么艰难，必须有人以担当和责任去思想。不管是否喜欢思想家，为了我们的精神归宿，都必须包容宽容思想家及其思想。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为了中国能够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201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生日之际完稿于国防大学

目录

CONTENTS

序言：思想家，远看很美

引 论

- 002 大战略源于大思想
- 010 中国实现战略突破的关键问题

大国领袖

- 022 引言：大国需要大国领袖
- 024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 048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 063 从推进改革角度明确习近平“新设计师”形象
- 071 转型中国需要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
- 081 将“全面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纳入习近平执政思想体系
- 085 解决任意解读“四个全面”的关键是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
- 089 习近平着力建构的是精神大厦
- 096 习近平清新执政三部曲：强改革重法治铸精神
- 100 “习式风格”引领官员人性回归
- 104 习近平言论蕴含执政新思维
- 112 拓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交路径

大国交往

- 116 引言：民族复兴需要更宽阔胸怀
- 120 中国崛起的深层制约与出路
- 127 中国不能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
- 133 中国梦亟需进行国际化解读
- 137 崛起的中国需要创新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
- 145 多渠道多形式加强中加交流合作
- 150 参与大国博弈的中国需要结盟
- 154 提升高铁输出的战略高度
- 157 核心价值与高铁一同输出的逻辑和意义
- 163 由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看大国崛起的本质
- 165 国家力量支撑不起膨胀的民族心理
- 168 意识形态斗争我们承压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 171 美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将一直领跑世界
- 174 以重构中美战略关系铺平我大国道路
- 179 适度调整我对日战略策略
- 185 以自我超越推进中国大国进程
- 190 参与大国博弈从找寻解决俄乌争端方案做起
- 194 探寻中国外援效益最大化的路径和措施